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

郭 圣 铭

一、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

在西欧，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初叶这三百年间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巨大发展。

西欧的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里，特别是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向封建势力进行勇猛的冲击。这种斗争在文化上的表现，便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原意，系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不过我们要知道，“文艺复兴”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主要的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的否定，艺术风格的革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即实验科学的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布等等。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说是“近代文化的开端”；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创新”。“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史上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它主要是创造出新的东西而不是恢复古老的东西。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四五页)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彼特拉克、伊拉斯谟这样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产生了但丁、莎士比亚这样雄视百代的文学家，产生了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这样古今无匹的艺术大师，产生了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这样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产生了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先进思想家。他们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放射着智慧的光芒。

文艺复兴运动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把人们的思想意识从神学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认识到其本身的价值。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人文主义”这一口号，把它作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旗帜。“人文主义”(Humanism，亦译“人本主

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us”(意为“人的”)演化出来的,它的涵义相当广,但主要是指一种信念,即:相信“人”是世界的主人和财富的创造者,相信“人”的智慧和力量,要求一切以“人”为本,发展“人”的事业。人文主义者搬出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的那句名言:“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他们主张:文学艺术要能反映“人”的真情实感,科学技术要能增进“人”的福利,教育要能发展“人”的智能。总之一句话,他们是要用“人权”的观念来代替“神权”的观念,用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来代替中世纪那种以“神”为本位的文化。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史学。这时西方史学开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一批卓越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牢笼,鄙弃那种虚妄的、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反对把《圣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当做历史,反对那种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用古代的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传统,他们把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奉为模式。到处搜寻波里比阿、普鲁塔克、李维、塔西佗等大历史学家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将之注释刊布出来,以广流传。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应当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应当以垂训为目的,因此他们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较早的国家向海外掠夺殖民地、肆行扩张的时期(即所谓“地理大发现”的时期),是市民上层和“王权”结为同盟以建立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的时期,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进行搏斗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爆发了世界史上第一次手工工人起义——一三七八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城的梳毛工人起义,爆发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和十六世纪后半期的尼德兰革命。当时社会各阶级的代言人都要借历史来讲话,都要用历史事实来阐明其政治上的主张,这自然带来了史学发展的高潮。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史上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一为大学的兴起和扩充,一为印刷术的开始广泛应用。这两件事都大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史学的发展。

本来,早在十二、十三世纪时,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图卢兹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便已先后成立。不过当时那些大学都还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行会”组织,师生员工不多,设备简陋,课程内容很贫乏。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那些大学才逐渐添设新的课程,扩充员额,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十四世纪时,捷克的布拉格大学、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意志的海德堡大学相继成立。后来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对现实政治的重大意义,各国的大学乃先后设立历史学讲座,延请名师讲

授。大学成了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中心,这当然有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并且使历史学走向专业化。随着学术的进步,历史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史学方法越来越缜密。

在欧洲,印刷术的应用远后于中国。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前,欧洲所有的书籍都是手抄本。欧洲最早采用印刷术的人已不可考,然而确实无疑的是:在一四五〇年左右,德意志人约翰·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第一次用活字版刊印《圣经》,此后印刷术才开始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应用。不言而喻,印刷术的应用在文教事业中起了一个革命,它使书籍大量印行成为可能,并且免除了手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笔误,更好地保证了书籍的质量。由于印刷术的应用和出版业的兴起,历史知识便比较易于普及了。

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史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经常是走在欧洲的前列。意大利原是罗马古典文化的老家,而资本主义因素又是首先在这里萌芽成长的,因此它就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和发源地。那些在十字军东侵时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城邦,如威尼斯、热内亚、米兰、比萨、佛罗伦萨,这时不但是工商业荟萃之区,而且成了新文化的摇篮。其中尤其是佛罗伦萨,于数百年间人才辈出,贡献独多,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圣地”。

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Petrarch, 一三〇四——一三七四年),主要是一位古典学者和诗人,但在历史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意大利城邦林立,互相间攻战不已,而列强趁机入寇,各自扶植党羽,更加深了意大利的分裂。彼特拉克有鉴于此,乃用历史事实来唤醒人们的爱国心。他模仿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爱涅德》的体例,用拉丁文写了一部史诗《阿非利加》,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统帅西庇阿·阿非利加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事迹。彼特拉克盛赞古罗马的“光荣”和“伟大”,他以古喻今,呼吁意大利各邦团结起来抵御外侮,以造成政治上的统一。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布鲁尼(Leonardo Bruni, 一三六九——一四四四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城,早年就来到佛罗伦萨,受业于希腊学者克里梭罗拉斯(Emanuel Chrysoloras),在其影响下养成了对古典文学和历史学的爱好。后来,他在政治上飞黄腾达,曾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秘书和佛罗伦萨的行政长官,但他真正的志趣始终是在学术方面。布鲁尼潜心著述,曾用华美的文笔,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名家的作品译为拉丁文,并且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和彼特拉克撰写传记。更重要的是:布鲁尼著有《佛罗伦萨史》十二卷,始于建城时期,止于公元一四〇四年,把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过程有了精详的叙述,堪称通史之作。布鲁尼首先在历史学领域内打出“人文主义”的旗帜,他复活了古希腊、罗马那些大历史学家的传统,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

供人们借鉴。他用理智的眼光来考察历史,摒弃了所有那些关于佛罗伦萨城的神话传说和无稽之谈,完全以历史事实来立论,着重叙述佛罗伦萨政治上的变迁及其在意大利各邦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马基雅弗利的先导。不过布鲁尼在其《佛罗伦萨史》中有关于一三七八年梳毛工人起义的记载,却囿于阶级偏见,他竟污蔑那次起义是什么“无知群氓的暴动”。

布鲁尼的同僚和挚友波基奥(Poggio Bracciolini, 一三八〇——一四五九年),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波基奥雅好古籍,他经常在各地修道院中搜寻古代作家的手稿,所获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塞罗的八篇演说词、卢克莱修斯的《论物性》、昆体兰的《雄辩术》以及塔西佗的《日耳曼志》等。有许多重要的古籍,都是赖有他的发现而重见天日的。此外,波基奥还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他首先认识到古物遗存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把考古学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波基奥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八卷,此书主题鲜明,文笔生动,可与布鲁尼的著作媲美。不过他有点象李维,过分注重文学描写,有时反而为辞害义,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与布鲁尼、波基奥同时代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 一三八八——一四六三年),为中世纪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比昂多首先是位考古学家,他精于鉴定古物,熟悉史料存在的状况及其价值的高下。他竭毕生之力研究罗马史以及西欧诸国兴起的历史,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精确的结论。比昂多著述甚富,其中最著名的是《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此书计有三十一卷,所叙史事始于公元四七二年,止于公元一四四〇年。它不仅体大思精,考证周详,而且对这一千年间的历史提出了新的解释。在这以前,历史学家多认为中世纪史是罗马史的继续。但比昂多指出:古代史已经随着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在那以后开始了另一个历史时期。他把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这一千年间叫做“中世纪”,“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比昂多的著作是西欧中世纪史的权舆,他的论点,后来逐渐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

在“文艺复兴”期间,欧洲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学有所发展。在这里,意义特别重大的是瓦拉(Lorenzo Valla, 一四〇六——一四五七年)对《君士坦丁的赠与》(Donation of Constantine)这一历史文件的辨伪。瓦拉是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的历史学家,他写过一部《斐迪南一世时期的历史》,并不怎样出色。瓦拉的才能偏于考证,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不朽之名。本来,在公元七五六年,法兰克王国的国王“矮子”丕平以其取自伦巴德人的、意大利中部的那一大片土地赠献给教皇,使教皇具有世俗权。这“丕平的赠与”(亦称“丕平献土”),便是教皇国的由来。然而,教皇还嫌“矮子”丕平的威望不够,乃假造了一个文件,说教皇国的领土是公元四世纪初年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所赠与的。历来的教皇,都把这个文件奉为至宝,以之作为教皇国立国的根据。在瓦拉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文件不可靠,但却不能举出充分的证

据。这时，瓦拉用他那渊博的知识和精密的考证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文件所用的拉丁语是公元八世纪中期的拉丁语，而不是公元四世纪初年的拉丁语。如果说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那么他怎么会不用当时的语法而用后代的语法呢？这便肯定无疑地证明此项文件是出于伪造。瓦拉的辨伪工作，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件公案，而且揭露出教皇是弄虚作假的，这就狠狠地打击了教皇的“权威”。

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无疑要数到马基雅弗利。恩格斯指出：“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四五—四四六页）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著作，我们应当略加论述。

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一四六九——一五二七年）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其父曾当过法官。他自幼勤学，博闻强记，精通古籍，尤其爱读波里比阿和李维的著作，早年就在侪辈中崭露头角。一四九四年，佛罗伦萨爆发了以牧师萨伏纳罗拉（Savonarola）为首的人民起义，推翻了美第奇家族僭主政治的专横统治，重新建立共和制。从一四九八年至一五一二年这十四年中，马基雅弗利一直是这个共和制的佛罗伦萨政府中最重要负责人之一。他曾经先后奉命出使意大利其他各邦以及法国和德意志，并被任命为最高行政机关“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长，主管军事和外交工作。但在一五一二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侵略军的支持下反扑过来，扼杀了佛罗伦萨共和国，造成僭主政治的复辟。由于政治上的毒怨报复，马基雅弗利被捕下狱，而且遭到苦刑拷打。次年获释，但被放逐出政界，此后他就息影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座小山庄中，以著述终老。

马基雅弗利主要地是个政治理论家。他目睹当时意大利内部四分五裂，外受法国、西班牙等强邻的侵略，兵戈扰攘无虚日，乃渴望政治上的统一，而把这项希望寄托在有能力的君主身上。一五一三年，即在他政治上失势的第二年，马基雅弗利写成宣扬其政治思想的《君主论》（亦译《霸术》）。在这本书里，他公然主张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蔑信弃义，不择手段。他甚至明目张胆地说，人心难测，君主单讲仁爱是不行的，与其受人爱戴，不如使人畏惧。这位曾经为共和制政府鞠躬尽瘁的马基雅弗利，写出这样一本坏人心术的书，侈谈暴君专制之道，究竟是何居心？关于这一点，历来各派学者曾进行过激烈的、无休止的争论。一般的论断是：马基雅弗利代表当时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这在当时原是有进步意义的。不过他所走的道路和他所鼓吹的那一套政治理论是反人民的。马基雅弗利把政治当做一种权术，这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后来所说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就是指那种蔑信弃义、一味玩弄权术的卑劣行径。

在被迫隐退的生活中，马基雅弗利乃专心致志地钻研史学，希望能从古代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启示。他细心阅读过李维所著之《罗马史》，

把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史事和当时佛罗伦萨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对比,感慨良多,随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劄记。后来他把这些劄记汇集起来,就成了一部《论李维》。马基雅弗利的用意很清楚,他希望人们能从他这部劄记体的著作中得知古罗马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以古为鉴,对当前的政治有所改革。此外,马基雅弗利还出于同样的动机,仔细研究过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战役,揆度形势,精心构思,写了一部关于战争的专著,题为《用兵之道》,那是近代军事科学的先导。马基雅弗利认为,民兵是保卫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然而,马基雅弗利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则是他那部在晚年才写成的《佛罗伦萨史》。一五二〇年,美第奇家族的权贵,当时任佛罗伦萨大学校长的红衣主教裘里奥·美第奇(后来他当选为教皇,称克莱蒙七世)聘请马基雅弗利为佛罗伦萨人民写一部历史。那位红衣主教约稿的意思,原是要美化佛罗伦萨的历史,为美第奇家族树碑立传。但马基雅弗利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却倾注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史学观点,使之超出了约稿者的要求。和那些在他以前的其他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一样,马基雅弗利能以理智的态度来考察历史,摒弃一切神话传说的影响,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历史,并注意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他这部《佛罗伦萨史》共分八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时期,止于一四九二年劳伦左·美第奇之死。第一卷是概括性的绪论,大致说明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的概况,以后即按照年代顺序叙述佛罗伦萨城邦兴起、发展的经过,事愈近则记载愈详。马基雅弗利是用历史事实来阐明他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他以古喻今,把古罗马和十四、十五世纪时的佛罗伦萨作对比,认为当时佛罗伦萨之所以不能把意大利统一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争持不下,而贵族集团之间又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国力为之虚耗。如果能把那些消耗在内鬲中的力量集中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那末佛罗伦萨也许早已追踪古罗马的雄风,成为泱泱大国了。马基雅弗利是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他评论佛罗伦萨政治上的得失,笔下常带感情,富有感染力。他苦心孤诣地借历史事实来宣扬改革之道,其中有很多就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具有独到的见解。正是由于有这些特点,他这部《佛罗伦萨史》就不同凡响,比其前人的同类著作高出一头,成为世界历史文库中不可缺少的要籍。后来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大卫·休谟在评论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时曾说道:“此书意存针砭,带有一种强烈的义愤,感人至深!”

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完成于一五二五年,而过了两年,即在一五二七年,他就逝世了。遗憾的是,他这部史书所叙述的史事止于一四九二年,没有谈到他自己在佛罗伦萨共和制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那段时期(一四九八——一五一二年)的历史。这也许是有难言之衷,故意避而不谈的罢。马基雅弗利生活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而他在晚年犹及见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和德意志农民战争,然而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他的史著中都没有反映。

与马基雅弗利同时期的奎普亚狄尼 (Francesco Guicciardini 一四八三——一五四〇年), 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奎普亚狄尼出身于佛罗伦萨城邦的豪门贵族, 早年曾在帕多瓦大学研习法学, 毕业后即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法学教授。然而他不久就转入政界, 曾一度与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共和制政府中共事, 不过他们两人因为政见不同, 原是不睦的。及至共和制政府倒台, 美第奇家族的僭主政体在佛罗伦萨复辟, 这两人在政治上的遭遇恰恰构成鲜明的对照: 马基雅弗利曾一度身陷囹圄, 而奎普亚狄尼则成了美第奇家族的座上客。看来奎普亚狄尼是个不倒翁, 能在政局已经改变了的情况下仍居高位。他曾经做过佛罗伦萨驻西班牙的大使, 后来又受到教皇克莱蒙七世的重用, 先后出任教皇国属下摩代纳、里基俄、罗马纳这三个邦的总督。

早在一五一〇年, 即当他还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时, 奎普亚狄尼就着手编著《佛罗伦萨史》。他这部书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一三七八年至一五〇九年, 其中对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佛罗伦萨的政事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奎普亚狄尼比马基雅弗利小十四岁, 然而他却比马基雅弗利早十年先写《佛罗伦萨史》。因此到后来, 马基雅弗利在编著《佛罗伦萨史》时曾写信向奎普亚狄尼请教, 是把他当做“畏友”的。不过, 奎普亚狄尼的这部《佛罗伦萨史》并没有写完, 而且当时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版。他这部著作的手稿封存了三百四十多年, 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第一次由他的注释者刊布出来。

奎普亚狄尼的传世之作, 是他那部在晚年才写成的巨著《意大利史》。奎普亚狄尼从其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得知: 佛罗伦萨仅仅是意大利的一个城邦, 单写佛罗伦萨的历史, 不能反映出意大利历史演进的全貌。当时意大利内部四分五裂, 各种政治势力争持不下, 而意大利各邦又都结外援以自固,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同盟关系。意大利被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 成为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强国之间进行王朝战争的鏖兵喋血之场。然而, 作为一个民族来说, 意大利人有其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利害关系, 是渴望能达成民族统一的。奎普亚狄尼有鉴于此, 觉得不能再从某个城邦的角度来写意大利的历史, 而必须从全局出发, 把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因此, 他就放弃了《佛罗伦萨史》后半部的写作, 而于一五三六年起开始动笔写他的《意大利史》。

从撰写《佛罗伦萨史》到撰写《意大利史》, 奎普亚狄尼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飞跃。在撰写《佛罗伦萨史》时, 由于主题范围的限制, 他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历史学家; 而在撰写《意大利史》时, 他就跳出了城邦的范围, 成为一个视野广阔、有全局观点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了。他这部《意大利史》共分二十卷, 始自一四九四年法王查理八世之入侵意大利, 止于一五三四年教皇克莱蒙七世之死和教皇保罗三世的当选。所叙史事不过四十余年, 然而, 它却是第一次打破地区的界限, 把意大利各邦的历史熔于一炉, 勾勒出当时整个意大利乃至西欧其他各国的概貌, 堪称意大利全史。奎普亚狄尼敏于观察, 对意大利各邦的政事瞭如指掌。他虽然不象马基雅弗利那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 但也是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来写历史的。他曾经指出, 当年列国纷争,

那些教皇和各国君主纵横捭阖,朝三暮四,说穿了,其行为的动机无非都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是受什么道德规范约束的。

奎普亚狄尼的《意大利史》不但以观点新颖见长,而且以取材精慎著称。奎普亚狄尼精于史料考证学,他认为: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把史事编写成令人悦目赏心的故事,而在于要拿出确实可靠的史料证据,让史料本身来说话。他在写这部著作时曾广泛搜集资料,尤其充分利用了罗马教廷的档案材料。奎普亚狄尼的《意大利史》是在他死后的一五六一年才作为遗著出版的,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十六世纪末叶就销行了十多版,并且很快就被译成多种西欧文字。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产生了许多卓越的艺术大师。这些艺术大师是时代的巨人,他们如银河群星,各炫异彩,其生平事迹和艺术活动是值得为之立传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艺术史家瓦萨里。

瓦萨里(Giorgio Vasari,一五一一——一五七四年)本人就是个画家和建筑家,他早年曾经跟米开朗琪罗学画,并曾广泛游历各地,到处访问艺术大师并对一些著名的绘画、雕刻、建筑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五五〇年,瓦萨里出版其所著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在这部书里,他用他那艺术家的彩笔,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活动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而他对人物的评价也是比较公正的,不因个人好恶而有所偏私。瓦萨里是西方艺术史的开山祖,他这部《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是不朽的。

应当顺便提一句,“文艺复兴”这个词最先就是由瓦萨里创造出来的。瓦萨里把十五、十六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看做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现”或“再生”,所以称之为“文艺复兴”。其实,当时西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包括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决不是“文艺复兴”一词所能包括的。因为后来有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用“文艺复兴”这个词来表示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就只好沿用了。

三、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的史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意大利以外的西欧各国也先后产生了人文主义史学。不过这些国家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经济情况各异,所以在史学发展上也各有特点。以下,我们按照国别来加以说明。

法国:法国与意大利是领土毗连的近邻,它们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关系一向是很密切的。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影响到的就是法国。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和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发展却有很大的不同。当意大利还是四分五裂并遭受外来侵略时,法国则胜利地抵御了外侮并扫清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发展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

从一三三七年到一四五三年,法国和英国断断续续打了一百多年的恶仗,史称“百年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封建主勾结法国的地方割据势力,率军长驱直入,蹂躏了法国大部分的国土,并一度占领巴黎,给法国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然而,英国的人侵激起了法国各阶层人士的爱国热忱,他们同仇敌忾,纷纷组织起民兵队伍,拿起刀枪来配合正规军作战,到处打击敌人,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奇迹。在这里面,“圣女”贞德(Jeanne d'Arc)的事迹是最为感人的。后来,法国人民终于把英国侵略军赶了出去,赢得了“百年战争”的最后胜利。

“百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大致上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但贵族的权力还相当大,国内还存在着一些离心倾向。及至宗教改革时期,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又分裂为天主教派、“政客派”和信仰喀尔文教的胡格诺派,他们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互相倾轧不已,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一五六二——一五九八年)的宗教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胡格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胡格诺派的首领——波旁家族的亨利取得王位,称亨利四世,是为波旁王朝之始。亨利四世为了维护法国的统一,乃放弃其原先所信仰的喀尔文教,改信法国绝大多数人所信仰的天主教,并于一五九八年发布《南特诏令》,允许新教徒有信仰自由。这样,随着波旁王朝的建立,法国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就更巩固了。恩格斯指出:“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五二页)。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史学,反映了当时法国历史上的这些特点。

十四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罗莎特(Jean Froissart,约生于一三三七年,约卒于一四一〇年)。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一度经商,后来弃贾就学,把宗教活动当做踏脚石,挤进统治集团上层。佛罗莎特虽然在文化教养上是法国人,但实际上是个国际性的人物。他曾周游列国,和许多国家的封建主都有联系。一三六一年,佛罗莎特前往英国宫廷中当客卿,受到和他有同乡之谊的英国王后腓力帕(Queen Philippe)的赏识,被任命为史官。一三六六年,他伴随英军统帅黑太子返至法国的波尔多城,后来又漫游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等地,经常出入于王公贵族之门,得以熟悉各国的政情并撷拾到许多历史掌故。他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对于交战双方的形势和几次重要战役的经过都瞭如指掌。佛罗莎特竭毕生之力,用优美的法文写了一部《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所叙史事始于一三二六年,止于一四〇〇年左右。这部书的范围相当广,但主要是记载“百年战争”的战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其中对克勒西战役(一三四六年)和波亚迭战役(一三五六年)的描述尤为出色。佛罗莎特是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写历史的,他渲染骑士的“忠诚”和“勇敢”,因此被称为“骑士的歌手”。在这部《编年史》中,佛罗莎特对一三五七年至一三五八年的巴黎市民起义、一三五八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

一三八一年英国的窝特·台勒起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不过他囿于阶级偏见,肆意诋毁这些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有许多话要从反面去理解。

法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推康米尼斯(Philippe de Commines, 约一四五——一五〇九年)。康米尼斯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原为勃艮第公爵“骁勇者”查理(Charles the Bold)殿下的重臣,后来归顺法王路易十一,曾被任命为首辅。一四九四年,法王查理八世出兵侵入意大利,他奉命出使威尼斯和米兰,接触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气氛。康米尼斯在晚年写成《回忆录》八卷,其中前六卷包括路易十一时代的政事,后两卷记述查理八世在意大利进行军事冒险的经过。他具有精辟的分析能力,遇事能究其底蕴,注重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尤其善于描写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在这方面,他实与马基雅弗利不相上下。康米尼斯强调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实用价值,他经常告诫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熟读历史,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的一把钥匙。

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波丹(Jean Bodin, 一五三〇——一五九六年),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一五六六年,波丹发表其所著的论文《理解历史的方法》,那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方法论。波丹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观点后来影响到孟德斯鸠和英国历史学家柏克尔(H.T. Buckle),形成了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此外,波丹又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占优势的是东方各民族;其次是地中海沿岸诸国;而最后是北欧诸国的兴起。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实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先导。

在宗教改革和“胡格诺战争”期间,法国的天主教派、“政客派”和胡格诺派都有其自己的历史学家,他们旗帜鲜明,党同伐异,各自用历史事实来支持其本身的政治主张和宗教信仰。在这些历史学家里面,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胡格诺派的历史学家道比涅(Theodore Agrippa d'Aubigne, 约一五五〇——一六三〇年)。

道比涅出身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为胡格诺派的领袖之一,是在宗教战争中被杀的。道比涅在童年时期就显露出优异的才华,据说他在六岁时就开始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在十一岁时就翻译过柏拉图的著作。从十八岁起,他就开始积极参与胡格诺派的活动,后来一直做到亨利四世的枢密顾问,为之谋划政事。在亨利四世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改信天主教以后,道比涅仍旧保持其喀尔文教的信仰,因此他被胡格诺派称为“卫道者”。道比涅在晚年用喀尔文教的观点写了一部《世界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所叙史事始自一五五三年,止于一六〇二年。这部书的取材范围相当广,它是以法国的宗教战争为中心来叙述欧洲的历史,此外还一鳞半爪地谈到亚洲和非洲的情况。不过道比涅是把历史当做其宗教信仰的注脚,并竭力颂扬亨利四世在历史上的作用,多溢美之词。他蓄意美化胡格诺派的事

迹，舛误甚多。

德意志：“德意志”在文艺复兴时期还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即德意志人所居住的地区。自公元九六二年以来，德意志在政治上有个名称，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但正如后来伏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亦非“罗马”，更不能叫做“帝国”。在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空壳子里，存在着几百个大小不等、实际上各自独立的王国、公国、侯国、伯国、自由城市以及上千个骑士领地。而在一三五六年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产生须经过七大“选帝侯”的选举，于是“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小，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更甚于前。在中世纪后期，德意志境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发展得相当快，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然而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是区域性的，当时还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因此种种，当时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

罗马天主教会曾利用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来扩大其势力，它把德意志当做“教皇的奶牛”，在这里予取予求，后来竟用出售“赦罪符”的勾当来聚敛钱财。但剥削愈重，反抗愈烈，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首先就是在德意志轰然爆发的。

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发表其所著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起初，宗教改革在德意志表现为全民性的运动。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对宗教改革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除了代表诸侯和市民上层的马丁·路德以外，还有代表平民和劳苦大众的宗教改革家托马斯·闵采尔。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德意志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

宗教改革的浪潮，给这个时期德意志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宗教问题的突出，这时在德意志，历史学又成了神学的奴仆。

在宗教改革期间，德意志史学领域中的斗争极为激烈。新教的历史学家称罗马教廷为“魔鬼的巢穴”，而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则称马丁·路德为离经叛道的“狂僧”。他们各自把历史事实当做论据，来攻击其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敌人。

首先，人文主义学者封·胡登（Ulrich von Hutten，一四八八——一五二三年）发现了十一世纪末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声讨教皇格里哥利七世的檄文。他把这篇檄文加以注释，广为刊布，更加深了人们对教皇的愤恨。此外，封·胡登还大量印行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瓦拉所写的那篇证明《君士坦丁的赠与》系出于伪造的论文，以揭露罗马教廷的虚伪和欺诈。

路德教徒试图以自己的神学观点来重新写一部教会史。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新教历史学家佛拉西斯（Matthias Flacius，一五二〇——一五七五年）。佛拉西斯是伊斯特里亚地方的学问僧，因求学来到德意志，后来在马丁·路德的影响下成为新教徒，并一度在威登堡大学担任教授，主讲《圣经·旧约》。在离开威登堡大学以后，他先后寄居在马格德堡、任拿、法兰克福等地，搜集资料，从事于历史著作。佛

拉西斯费了二十年的精力,在六位志同道合的学者的协助下,写成一部巨著《马格德堡世纪史》(Magdeburg Centuries)。此书叙述基督教义和基督教会发展的经过,始于传说中的耶稣·基督的诞生,止于一三〇〇年。因以一百年为一卷,共十三卷,故称《世纪史》。佛拉西斯和他的助手们列举了无数的事例,证明天主教的教义和教会组织是与原始基督教不相干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于天主教会的信念。不过,佛拉西斯是企图以路德教的神学观点来代替天主教的神学观点,其本身也是一种僧侣主义的东西。

德意志最博学的新教历史学家,应推斯莱登(John Sleidan,约一五〇六——一五五六年)。他原先在外交界服务,曾在公余之暇把佛罗莎特的《编年史》和康米尼斯的《回忆录》译为德文。从一五四五年起,斯莱登花了十年的岁月,写成《皇帝查理五世时代政治、宗教情况实录》,共二十六卷。这部书体大思精,始于一五一七年马丁·路德的发难,止于一五五五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成立,把德意志宗教改革的经过作了全盘的叙述。斯莱登虽然主要是记载宗教改革运动,但也充分注意到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政治是和宗教交织在一起,不能分开的。斯莱登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研究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历史的要籍。

英国,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得比较晚,它在这方面曾受到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影响。

紧接着英、法“百年战争”之后,英国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王位,又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内战,那就是历史所说的“玫瑰战争”(一四五五——一四八五年)。经过这场内战,英国封建贵族的势力是大大削弱了。当亨利七世即位、建立了都铎王朝时,英国大致上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君主国。

在都铎王朝时期(一四八五——一六〇三年),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正在加速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剥削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一方面,地主资本家正在强力推行“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其世代所耕种的土地上赶走,圈起土地来养羊,致使英国发生着象托马斯·莫尔所说的“羊吃人”的惨剧;另一方面,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向海外扩张,他们从海盗抢劫、奴隶贸易、走私活动中囊括了盈千累万的财富。这时英国出现了一个“暴发户”的资产阶级和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还是拥护“王权”的,所以都铎王朝的几个国王都是专制君主,其权力之大是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就是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兴起。而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英王亨利八世自上而下地实行了宗教改革。不过英国的宗教改革是有反复的,之后有一段时期,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斗争极为激烈。直到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后,才确立了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结果是不满

的,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所残留下来的天主教仪式,他们被称为“清教徒”。

都铎王朝时期,特别是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年),英国在学术上呈现出高度繁荣,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托马斯·莫尔、弗朗西斯·培根以及莎士比亚等,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英国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史学。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一四七八——一五三五年),也是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除名著《乌托邦》之外,莫尔还写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这部书先是用拉丁文写的,后来又由他自己译为英文,两种版本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莫尔用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生花之笔,绘形绘声地刻画了暴君理查三世(在位年代为一四八三——一四八五年)的凶残狠毒及其最后的被杀,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因而也就从反面伸张了正义。后来莎士比亚的名剧《理查三世》,主要便是根据莫尔的著作编写的。

当女王伊丽莎白在位时,英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发展得很快,这时产生了编年史家何林设德(Raphael Holinshed,生年不详,约卒于一五八〇年)。关于何林设德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甚少,只晓得他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曾经被女王的印务官,德籍客卿乌尔夫(Reginald Wolfe)聘为助手。本来,乌尔夫搜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正在编著一部大型的《编年史》,但未及完成此项工作就去世了。何林设德继承乌尔夫的史业,他以乌尔夫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和草稿为基础,勒成删定,写成他那部著名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这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女王伊丽莎白在位的初年,取材宏富,文笔生动。何林设德的著作被认为是信史,当时有许多诗人和文学家都从那里面吸取创作的素材。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李尔王》、《马克白斯》、《辛伯林》等,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与《马格德堡世纪史》的编著者一样,英国的新教徒也是把历史当做进行宗教改革的论据。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福克斯(John Foxe,一五一六——一五八七年)。福克斯早年曾在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读书,因笃信新教,反对校方钳制思想,乃愤而退学。当“血腥的”玛丽女王在位时,天主教一度在英国复辟,福克斯被迫流亡到德意志。直到新教徒伊丽莎白女王登极,他才返回祖国。福克斯用炽烈的热情和动人的文笔写了一部《基督教殉道者行传》,叙述威克立夫、约翰·保尔、约翰·胡司等宗教改革家殉道的事迹,用以揭露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残忍,宣传宗教改革的正义性。福克斯的著作曾轰动一时,成为新教徒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当时英国的新教教堂里都摆着两部书:一部是《圣经》,另一部是福克斯的《基督教殉道者行传》。

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家,喀尔文教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一五〇五——一五七二年),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根据其实际斗争的经验,写成一部文情并茂的《苏格兰宗教改革史》。此书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一五五五年至

一五六四年,详述苏格兰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苏格兰人民反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党派之间的倾轧,以及长老会教在苏格兰取得统治地位的经过。由于诺克斯本人是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主角,他的著作在颇大的程度上象是回忆录,提供了可贵的事实材料。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威廉·堪登(William Camden,一五五一——一六二三年)。堪登曾经在牛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教育,他熟悉古代典籍,追慕古代的历史学家,尤其崇拜波里比阿。堪登是英国国教徒,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历史为这个阶级的政治服务。堪登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大不列颠志》(Britannia),记述英国的山川形势、名胜古迹、历史掌故、民情风俗、文物制度等等,其中洋溢着爱国热忱;一为《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格兰、爱尔兰史》,竭力渲染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瑞士史学家傅脱认为:近代英国的史学是从堪登开始的。

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年),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除了《新工具论》等不朽的哲学著作和一部反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西洋岛》以外,弗朗西斯·培根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他以哲学家的眼光和概括能力,提纲挈领,正确而又生动地剔抉出都铎王朝初期英国的历史概貌。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他曾经说道:“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

尼德兰在中世纪后期是西欧的先进地区。十六世纪后半期的尼德兰革命,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经过数十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建立了资产阶级的荷兰共和国。

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国际法”的始祖格劳修斯(Hugo Grotius,一五八三——一六四五年),在历史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格劳修斯生活在“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期间,他看到战争所造成的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希望用一些公认的准则来限制交战双方的暴行,乃于一六二五年发表其所著的《论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法》,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格劳修斯雅爱史籍,他写过一些关于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的历史著作,并且为荷兰史、比利时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格劳修斯认为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对后世有教育作用,所以他特别注重阐明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用以垂训方来。

和格劳修斯同时的荷兰人文主义学者荷夫特(Peter Cornelius Hooft,一五八三——一六四七年),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更为巨大。荷夫特出身于阿姆斯特丹的权贵之家,因醉心于外国的先进文化,曾漫游德意志、法国、意大利等地。他在政治上追随奥兰治亲王,后来被任命为敏登城(Minden)的行政长官。当其在任期间,他把

敏登城变成了荷兰学术文化的中心。荷夫特曾经把塔西佗的著作译为荷兰文,并且模仿塔西佗的为人和文章风格,所以当时人们就称他为“荷兰的塔西佗”。当时西欧各国的学者仍多用拉丁文写作,而荷夫特则坚决主张用本国文字来著书立说。他用荷兰文著有《尼德兰史》二十一卷,其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一五五五年至一五八七年,描述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读之令人奋起。荷夫特是一个语文巨匠,他的著作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推进了荷兰文的发展。

四、“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史的编纂

从十五世纪末叶开始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急速地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大大地扩大了西方人的眼界。地理大发现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世界史的编纂成为可能。

本来,在地理大发现以前,西方国家的旅行家和外交家就留下一些关于东方国家的记载,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和克拉维约的《出使帖木儿宫廷记实》。然而,只是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人才开始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有较多的了解,并且开始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

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欧洲的航海家和冒险家曾留下一些记载。例如,哥伦布本人就写了不少笔记,叙述其历次航行的经过和发现。在麦哲伦身边当水手的毕加菲塔(Antonio Pigafetta, 一四八〇——一五三四年),写了一部《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记》。不过这些记载大都是粗糙的、夸大其词的,我们只能披沙拣金,从那里知道一点关于地理大发现的概况。

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者叙述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绝大多数均系为殖民主义张目。他们夸大印第安人的“原始”和“落后”,妄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虐杀说成是“宣扬文化”的行为。但这里面也有一个例外,那便是拉斯·卡萨斯(Bartholomew de Las Casas, 一四七四——一五六六年)。一部殖民史是充满着惨绝人寰的血腥事迹的。殖民主义者不仅掠夺土著居民的财富,摧毁其文物制度,而且整批整批地把他们的部落或部族绝灭掉。当西班牙的殖民者最初来到西印度群岛时,印第安人居住在古巴的约有三十万之众,居住在海地和多米尼加的约有二十五万人,居住在波多黎各的约有六万人。可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这些无辜的印第安人就几乎完全被斩尽杀绝了。这种涂毒生灵的罪行,在拉斯·卡萨斯的著作中受到了谴责。

拉斯·卡萨斯是一名多米尼克派的僧侣,青年时代就来到美洲,先后在古巴和墨西哥担任过主教。他亲眼看到西班牙的殖民者无恶不作,任意烧杀抢劫,使当地印第安人面临着全体灭亡的悲运,乃激于义愤,出面请求西班牙国王改用比较开明的政策来统治其在美洲的殖民地。拉斯·卡萨斯写了两部书,一为《西印度群岛的毁灭》,

控诉西班牙殖民者那种绝灭人性的暴行；一为《美洲史》，记载西班牙统治集团在美洲进行拓殖的经过。拉斯·卡萨斯的著作是一字一泪的，他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使人们得以明白西班牙殖民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西班牙的另一个殖民者哥马拉（Francisco Lopez de Gomara，约一五一〇——一五六〇年）写了一部《美洲通史》，记述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经过。哥马拉曾经做过殖民大盗柯泰斯（Hernando Cortez）的秘书，熟悉西班牙统治集团的内幕，他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史的编纂成为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五四——二五五页）在西欧各种文字中，“文学”（Literatur, Literature）一词兼有“文献资料”之义。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文献资料成为可供全世界人阅读的文献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才产生了世界史。

地理大发现给历史学家打开了广阔天地，使他们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并且可以在国别史的基础上编写出综合性的世界史。然而，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开始出现的世界史，有其时代的烙印。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编写的世界史都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即“西欧中心”说。他们荒谬地把世界史看成是欧洲的扩张史，肆意贬低、侮蔑亚、非、美、澳各族人民。那种反科学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应当彻底予以批判。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人文主义史学是对中世纪僧侣主义史学的否定，它拨开基督教神学的迷雾，着眼于现实世界，要求用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历史，这就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的末期，已经是十七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后来到了启蒙时期，西方史学又有新的更大的发展时期。

〔本文作者郭圣铭，一九一五年生，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曾撰写《世界古代史简编》、《西方史学史》等专著。〕